



跨世紀國際藝文資訊 從世界的視角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閱讀文化
On CULTURE And ARTS Experience in Resource
Management

議題三
城市外交與國家文化形象
Arts and Culture Exchange Across Nations

市民社會理想與城市文化交流

陳其南

現任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學歷

美國耶魯大學文化人類學碩士、博士

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碩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系學士

主要著作

《傳統意識與社會型態的結構》(1997)

《家族與社會：台灣與中國社會研究的基礎理念》(1990)

《文化的軌跡》(1986)

《台灣的傳統中國社會》(1987)

CHEN, CHI-NAN

Present Positions

Professor and De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Hsin-chu, Taiwan

National Policy Advisor, The President Office, Taiwan

Education

Ph. D. (Anthropology), Yale University

M.A. (Anthrop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B.A. (Geograph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Working Experience

Professor, Graduate Program of Traditional Arts, National Institute of Arts, Taipei, Taiwan

Director, The Youngsun Culture 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I-lan, Taiwan

Vice Chairman, Council for Cultural Affairs, Executive Yuan, Taiwan

Chairman & Senior Lecturer,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pecialized subjects

Cultural Policy and Cultural Studies, Loc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Globalization, Space Theory and Postmodernism, Family and Kinship, Anthropology and Political Economy, China, Japan and East Asia



市民社會理想與城市文化交流

陳其南、孫華翔、蔡秀芬

此次研討會邀請了不少國際藝文界專家學者來到台灣，而來到台灣的外國朋友，多半會想去參觀台北故宮博物院的文物珍寶。在故宮為數眾多的珍貴收藏中，「唐三彩」一類的器物可說是少數當中名聞中外的重要藝術品。這些三彩器物的珍貴與重要性，除了展現大唐社會當時的繁榮與華貴，其陶器上主要的黃、綠、藍三種顏色更是具體而微的呈現唐朝國力的強盛、版圖的遼闊（遠及中亞一帶）與對外交通的發達。因為唐朝政權最初來自於北齊、北周系統，文化上多染有胡風與鮮卑色彩，在陶器技藝上，以其當時融合南方漢人和北朝民族的技術，只能燒出黃、褐和綠色。然而當時西域貢品的陶器多呈藍色調，引起執政者好奇，遂大量引進來自於現今敘利亞一帶國家出產的釉料「鈷」（使陶器燒出藍色的一種礦物），經由絲道的通路來到大陸中原，於是奠定「唐三彩」器物色彩絢麗的特色。這是文化交流的結晶，也是藝術文明透過文化交流所產生的動人力量。

除了東方國家，西方國家也到處有這種經由文化知識的傳播與交流，而帶來文明進步或文化變遷的例子。像是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大師的偉大成就與發明，如科學性透視法的發現，與解剖學的知識對繪畫風格的影響，以及古代圓頂式教堂建築的知識等等，均引起阿爾卑斯山以北諸民族的矚目，每個對新知識的復興有興趣的人，都漸漸到義大利這個發掘古代智慧與寶藏的地方取經。當文藝復興新知融入了歐洲北方各民族的文化傳統，使得這些民族的藝術與文明，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和改變，直到今日，不論是在英、法、德、荷等國觀光，人們仍可從其繪畫典藏、教堂建築與雕刻，看見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的文化影響。

正因為文化交流對人類文明的發展與歷史的進程如此重要，所以當前世界各國的文化交流政策均在其文化政策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文化交流流傳演變至今，出現了一股不可忽視的全球性潮流——即文化交流「地方化」，像是世界知名的英國愛丁堡藝術節、法國亞維農藝術節及坎城影展、義大利的威尼斯雙年展與威尼斯影展，以及近年來台灣宜蘭的國際童玩藝術節等。此次研討會也許正是因為主辦單位感受到這股明顯的趨勢，因而以「城市外交」為題，也就是以「城市」或「地方」為切入點，來探討文化交流的相關議題，作為這場研討會的主題。過去人們對於「外交」的觀點多停留在國與國之間國家利益能獲確保的認知，然而究竟什麼時候「城市外交」逐漸登上國際外交舞台，且旋即成為文化交流一股不可忽視的趨勢？這裡實有必要從一個更大的趨勢來理解，那就是——全球化的趨勢。



一、全球化與城市外交的時代意義

科技的創新與研發，往往成爲人類歷史變遷與社會趨勢改變的重要因素。蒸汽機的發明帶動火車、輪船的創新，使人類增強其克服如沙漠、海洋等自然屏障的能力；加上安德森（B. R. Anderson）所觀察歸納的，包括印刷術發達所帶來的知識擴散、馬丁路得的宗教改革所引起的語言疆界，以及統治者在國家版圖擴增的同時感到國家語言的重要等因素，這種種因素皆使得人們感覺到疆界的存在與威脅感，人們爲保護自己的疆界，於是逐漸形成安德森所說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¹，也就是民族意識與國家主權的觀念，此即十九世紀中葉所發展出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的概念，也是現代國家的起源。

然而進入廿世紀，尤其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全球科技、交通與資訊流通的技術呈等比級數的速度不斷前進，使得全球國與國、團體與團體、地方與地方、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越來越頻繁，這些交流與互動進入到一個境界，幾乎是沒有空間與距離，且任何一個人一天的生活可能就很「全球化」（Globalization），像是早上喝來自紐西蘭的牛奶、出門前擦法國名牌香水，中午吃麥當勞、下午喝義大利的 Espresso 咖啡，傍晚用 Kitty 貓外型的大哥大找朋友去法國餐廳吃飯等等，這種全球化不僅展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更在經濟、環境生態、科技研發、文化、與公民社會等層面，處處衝擊著「民族國家」與「國家主權」的觀念，同時國際社區間彼此互相依賴的程度之高，也是過去歷史前所未見，所以現在坊間到處可以看到「民族國家之終結」等這類的書。

全球化影響下的骨牌效應

這些改變可從一些跨國現象，幫助我們更認識全球化的樣貌與影響，像是跨國問題，如：氣候生態變化、種族衝突、愛滋病、貨幣危機等；或是跨國組織，如：世界銀行、國際紅十字會、跨國企業、國際環保團體等；以及跨國事件如：奧運、地區戰爭、亞洲金融風暴、國際性的藝術節或活動等等。²這些跨國現象使得民族國家和社會的統一性受到嚴重考驗，且形成了新型態的權力和競爭關係，也就是既有國家機器，與跨國形勢、跨國社會、跨國認同等之間的衝突與對立。

另外，基於一些原因與發展走勢，許多關心全球化趨勢的學者均看出全球化已是難以逆轉、無法回頭的世界趨勢，這些原因像是：國際貿易的擴展與互動密度不斷提高，使跨國集團權力亦不斷增長；資訊和通信技術的持續革新；政府之外的跨國行動者數量越來越多，權力也越來越大；全球性的環境破壞與生態問題日益嚴重，需要後續更多全球性的彌補和維護等等。³若這些現象持續結合空間、時間與互動密度不斷的發展下去，也將會爲全世界帶來相對的危

¹ B. R. Anderson, 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台北：時報，1999

² Ulrich Beck, 全球化危機—全球化的形成、風險和機會，孫治本譯，台北：商務，1999，p.51

³ ibid., p.15



機，且呈現的將是一種從通訊科技→經濟體系→生態環境→文化呈現→公民社會認同，一連串改變的骨牌效應。

細看這些效應的變化，首先是通訊科技的進步帶動了跨國企業的發展，跨國企業的發展帶來經濟全球化的潮流，然而，就一些社會學者的觀察，經濟全球化是資本主義體系的延伸。換言之，資本主義世界當中的利益最大化原則，透過全球化而突破了來自各國政府的節制與「阻礙」，於是能「自由」地在國際市場實現其獲利前景，同時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也將為全球帶來三個等級的剝削關係：中心國家、半邊陲國家和邊陲國家，且此一體系不但能帶來巨大的財富，同時也將產生巨大的貧窮，形成全球不平等的模式。⁴

而這種不平等模式中最為嚴重的即是生態問題與發展問題，也就是「中心國家」透過剝削「邊陲國家」的行動，以完成其開發計劃並贏得巨大財富，這些「剝削」行為，像是赤道雨林的砍伐，有毒垃圾造成的海洋與土質污染，生化科技與核子工業的潛在危險等等，這些國家破壞生態的結果，最後也因難逃生態不平衡所帶來的副作用而自食惡果，於是全球生態保護的意識由此產生。

在此同時，經濟行為的全球化亦對文化、認同與生活型態有深遠的影響，而此影響尤其令不少學者關注的是，透過跨國企業如麥當勞的企業文化、電影工業如好萊塢的電影文化，或各種消費文化等，所可能帶來的文化一致化或均質化。他們最擔心的是，當整個世界因全球文化聚合而帶來文化與生活方式的統一，或因市場效應變成「單一的商品世界」時，地方的文化和公民的社會認同也將被跨國集團的廣告和商品文化所取代，而這也是文化界人士最不願意看到的結果。⁵

另外，向來關心資訊社會與全球化為城市發展帶來影響的都市政治學者柯司特(M. Castells)亦認為，當前資訊社會與全球化的趨勢與城市發展緊密結合，形成所謂「資訊城市」或是「全球城市」，而城市中的資訊生產者雖然為數不多，卻在文化上支配了整個城市，形成了具有霸權的社會階級，並進一步型塑市民社會的意向，資訊專業人士與勞工階級之間的分化因此越演越烈，而彼此相互依賴（富者依賴窮人的服務，窮人需要富者提供的收入）的程度也將日益嚴重，就形成他所稱的「雙元城市」（貧富兩階層同時存在於同一城市），於是「資訊城市」、「全球城市」、與「雙元城市」便成為一體多面、密切相關的「後現代城市」了。⁶

然而面對「全球城市」所可能帶來的文化資訊的壟斷，與資訊單向流通所產生的文化一致

⁴ 此乃社會學者I. Wallerstein 觀點，引自Ulrich Beck，*全球化危機—全球化的形成、風險和機會*，孫治本譯，台北：商務，1999，p.47

⁵ Ulrich Beck，*全球化危機—全球化的形成、風險和機會*，孫治本譯，台北：商務，1999，pp.44-60

⁶ Manuel Castells, *European Cities, the Informational Society, and the Global Economy*, *New Left Review*, 1994, (Mar.-Apr.) p.30 & M. Castells, *The Informational Ci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the Urban-Regional Process*. Oxford: Blackwell, 1989



化，柯司特進一步指出，透過尋求增強地方政府的力量、鄉里分權化和城市自我經營所動員的市民運動（citizen movement），共同對抗社區居民因日益異化所產生的文化標準化，將可維持地方或社區來自種族、歷史或地方情感的地方自主。⁷簡言之，地方的實踐與行動，將是對抗全球化城市所帶來的資訊或文化宰制的重要策略，而這也是當前為人所熟知「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的重要理念之一。

全球地方化的城市外交

事實上不光是柯司特，目前世界各國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注意到這股無法擋的趨勢，就連可口可樂等企業集團也在強調「全球地方化」，他們認為，越是在全球範圍生產和行銷其產品的公司，就越需要發展地方的條件，也就是汲取地方文化的精神與特色，才能產生更生動、更具地方親和力的產品包裝。他們同時認為，全球化並不是指在世界各地建造工廠，而是成為各地方文化的一部份，這種策略又被稱為「地方主義」，且隨著全球化的實現，地方主義也越來越重要。⁸

這是很有趣的現象，當全球化的趨勢越往前邁進，地方性的角色就越來重要、越顯著。像是日本在 1980 年代進行所謂「造町」（好比台灣的「造村」）運動，或是英國一些地理學著作，也開始強調消費地方（consume places）的觀念，這雖然是一從資本主義衍申出的概念，但這些例子的重要意涵均在於培養地方感、發掘地方的特色，進而營造地方的吸引力，簡言之，也就是展現一個地方的精神（spirit of the place）⁹。

然而地方精神從何而來？來自於地方執政當局的定位？還是單純從地方傳統去尋找？從全球化與民族國家意識的衝突中不難發現，全球地方化的趨勢亦伴隨著「去中心化」與「解地方化」的思潮。套用德國社會學者貝克（Ulrich Beck）的用語，「再地方化」是經由不斷的「解地方化」來進行，而且不是一味只從歷史傳統或原鄉情懷來定位地方文化，因為地方文化不能單單建立在對世界的防禦以證明自己的文化的正統性¹⁰。同時透過傳統主義所定位的地方文化，不一定能為地方帶來真正的復興，相反的，全球地方化乃是社區在全球體系的文化情境中，透過地方或社區之間居民的不斷交流、對話、辯證、衝突與反省，使居民重新理解自己居住的地方文化內涵，進而經由市民參與去重新定位當地文化特色、決定地方未來方向、振興地方各種產業等等，也就是「再地方化」；而由地方居民親身參與決策以取代過去執政者集權的過程，正是「去中心化」的表現。這種地方公民透過彼此交流、學習與辯證而參與文化事務的理念，正是今日我們所要談的主題——城市文化交流的真正內涵。

⁷ M. Castells, *A Cross-Cultural Theory of Urban Social Change, 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 of Cal., 1983, pp.308-315

⁸ Ulrich Beck, *全球化危機—全球化的形成、風險和機會*，孫治本譯，台北：商務，1999，p.63

⁹ 陳其南，*空間理論與後現代主義地理學*，環境與世界，高雄師大地理學系期刊，第三期，p.192

¹⁰ *ibid.*, p.64



由於城市與城市、地方與地方之間的交流是「解地方化」與「再地方化」的重要過程，城市外交或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也因此與日俱增。故此，從全球化的趨勢到地方化，地方化又與地方之間交流互動密切相關，「城市外交」的時代意義即從這裡展現出來，同時也可從這裡來理解為什麼「城市外交」已隨時代的改變，而逐漸取代或影響傳統的「國家外交」。

此外，全球地方化除了被認為是挽救文化壟斷、文化均質化的重要策略外，更重要的是，透過地方所形成的地方意識與市民運動，一方面能有效對抗資本主義式經濟的不平等剝削，另一方面地方亦可結合國際組織的力量來防止地區性的生態破壞。而社區公民社會的認同與世界公民的認同，以及地方文化的多元展現，均可透過地方化的過程得到平衡而適當的定位與發展。簡單地說，先前討論全球化可能帶來全球性的負面骨牌效應，在此即可透過「全球地方化」的地域實踐找到挽救之道。

二、文化、地方與市民社會的城市交流

事實上，前述的討論中，提及了不少與「全球地方化」相關的重要名詞與概念，像是「地方精神」、「地方定位」、「地方振興」、「地方交流」、「市民社會」或柯司特所指的「市民運動」等等。然而究竟如何連結這些抽象概念，進而透過行動來實踐這些理念？最能有效整合上列概念，且符合當前趨勢需要的，不是靠政治號令，也不是靠經濟操作，而是——文化。

文化的時代

「地方化」時代的來臨，同時也宣告「文化時代」的來臨。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近年來不斷強調文化權是世界基本人權的重要內涵，而公民文化權的理念，主要即是在保障公民自由而平等的「創造」、「交流」、「學習」等機會，也就是保障所有世界公民均享有「參加文化性生活的權利」¹¹。

而當代重要的美國政治學者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於 1993 年發表的《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一文中，亦認為在後冷戰時代共黨解體後，未來世界的競爭，將不再是民主與共產的競賽，也不再是國防軍備的競賽，而是不同文明體系之間的矛盾與衝突，且「西化即等同於現代化」的慣性思考也會備受考驗與批判；若有第三世界大戰爆發，他認為那將可能是文化與文化之間的戰爭。¹²

此外，進入新世紀，「如何反應英國在新時代的新定位？」成為英國各界在千禧年最熱門的議題之一，英國的外交部門想到以「文化」來回應大家的期待。2000 年 4 月，英國外交大臣

¹¹引自 UNESCO 在 1976 年第十九屆年會的世界人權宣言。

¹² 《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一文最先發表於 1993 年的外交事務季刊（Foreign Affairs），後來杭亭頓根據此文獨立出書，也就是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一書，目前黃玉美譯的中文版「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已於 86 年由聯經出版。



召開會議，特別提出「打造英國新品牌」的訴求，並結合其他相關部門，以文化為主要執行方向，以期在國際間能重新擦亮「文化英國」的招牌，這些政策包括：落實英國「多元文化」的目標與精神、提出以振興藝文或電影相關產業的「創意工業」政策，以及改善社會弱勢團體「參與藝文的社會公平」等。¹³

此外，當前世界知名的都市，或經常吸引大批各國觀光客造訪的城市，其特色均離不開文化因素：像是法國巴黎的羅浮宮、美國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英國倫敦的音樂劇、日本奈良的傳統建築；或是當地具特色的國際活動，如：英國愛丁堡的藝術節、法國亞維農藝術節、坎城影展、義大利威尼斯雙年展、威尼斯影展、維也納的音樂節，以及台灣宜蘭的國際童玩節等等。上述這些例子都在宣告文化時代的來臨，同時也可明顯看出「文化」在全球化、地方化的趨勢中，早已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文化」亦是左右城市外交或城市交流成效與品質的重要關鍵。然而，上述城市是如何透過文化展現其地方魅力，以吸引大量外國觀光客？其重要的因素在於這些城市均有清楚、明晰的地方文化定位。

地方文化定位與內涵

世界上任何一個人，都有其獨特的性格，同樣的，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也必定有其獨特之處。而「地方文化定位」即是地方成員為地方文化特色的現況與期待所做的命名。如：奧地利維也納為「音樂文化之都」，或台灣的新竹市假設為「文化科學城」等。然而，這些定位中所強調的「文化」究竟指的是什麼？以台灣新竹市為例，「文化科學城」所指稱的「文化」，並不僅是基於對某些特定項目如科學園區、清交大等科研機構、玻璃產業、米粉貢丸，或是藝文團隊的強調，而是希望新竹市在擁有科技的產業特色之外，能夠同時擁有一個具「文化內涵」的生活環境，它標示了市民對城市生活環境的期待與許諾。因為如果「文化定位」只是一種模糊的生活期待，而沒有一些明確的方向，所有的努力就只會是個別活動任意的堆積，而無法發揮出整合性的力量。

所以文化定位的內涵，就是對文化生活理想狀態的定義與主張，它同時也是地方施政的具體方向。例如：「使這個城市有許多具文化特色的街道」、「讓老人有適合且便利的休閒娛樂設施」、「結合歷史地景與藝文活動以使古蹟在現代生活中擁有新生命」等等。

文化內涵的定義是一種文化生活狀態的說明，當這個狀態結合上地方特有的文化資源，或是努力獲得相當的成果時，文化內涵就會發展成地方的文化特色。文化特色可以是某種民藝、產業、地景或是藝術形式，像「藝陣之鄉」、「戲曲之都」、「兒童夢土」、「建築美城」等等定義，都是文化內涵變成文化特色的例子；甚至「老者之鄉」、「原民夢土」等考量弱勢社群需

¹³ <http://www.britcoun.org>



求所進行的善意安排，也可以是一個地方所要強調的文化特色。¹⁴

文化內涵並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可以隨主客觀環境的轉變進行調整，也就是先前所提不斷「解地方化」的過程。一個地方應該同時擁有幾個不同的文化特色，才可能支撐出豐富的文化內涵。一個地方的文化定位若有了文化內涵的定義，才是完整的文化定位，這樣的文化定位也才會有生命，才能成為文化政策規劃的依據，否則「文化定位」便只是一種用來粉飾文化貧乏的政治符號。有了文化內涵定義之後，地方文化藝術才能在各種文化藝術形式中找到方向，才能在廣度中產生深度，有了深度，地方特色塑造才有可能。¹⁵

然而地方的文化定位與內涵，並不是單由地方政府指揮與決定，而是需要經由所有具公民意識的地方成員共同參與和對話，所形成的共識和抉擇，這也就是西方「市民社會」的重要精神。

市民社會的形成要件

從歷史傳統來看，對比於西方國家，東方國家長久以來似乎較欠缺「公民意識」或「市民社會」的概念。以台灣為例，台灣社會過去長久以來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多只強調血緣和民族意識，較缺乏公民意識和理念。所謂「公民」(citizen)，在英語是「市民」的意思，西方傳統的「市民」已包含了「公民」的概念，所以中文譯為「公民」的確很適切。就西方歷史的語意概念來看，「公民」或「市民」基本上是與「自然人」相對的，「自然人」有血緣關係與家族認同，「公民」卻是一個「社會人」、「政治人」，是一個屬於「公」的人。然而，我們的文化傳統很難突破自然人這層觀念，進而發展到「公民」意識，成為台灣社會發展中一個相當關鍵的問題。¹⁶

一個成熟的公民國家和公民社會，從事任何涉及國家與社會的公共關係與事務，最優先和最根本的出發點，多是先確立公民身分和公民意識¹⁷，但是在台灣卻不是這樣，台灣不論是政治活動地方自治團體、社會團體和職業團體，多半未能擺脫政治意識型態的制約，使整個社會浸泡在泛政治化的氛圍中，城市外交或文化交流的政策影響所及，亦充滿了政治味，像是認為只要打進國際市場，就能光宗耀祖、為國爭光，政治意識型態的觀念超越了公民社會的概念，社會的各個成員因而缺乏一種社會參與和公民倫理觀念，最後的結果又回到傳統帝國時期的型態，也就是依賴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間的上下管理結構，而這個根本的癥結問題，早已成為台灣要進入公民國家體制的嚴重瓶頸。

¹⁴ 文化環境工作室，台灣縣市文化藝術發展—理念與實務，台北：文建會，民 88，pp.63-64

¹⁵ *ibid.*，p.65

¹⁶ 陳其南，公民國家意識與台灣政治發展，台北：允晨，民 81，pp.6-7

¹⁷ *ibid.*，p.9



在建立「公民國家」觀念的過程中，有一個重要的觀念不能忽略，那就是「契約」。契約不一定是書面或形式上的關係，最重要的是彼此在觀念上的認知和內心所意識到的一種權利義務關係，而這種認知乃是基於個人生存需要與外在社會所建立的關係，其中多半是整體社會無形的制約，也就是「共識」，因此「契約」在公民國家或公民社會中有決定性的作用，透過契約概念的內化，很自然的產生「共同體」(community)的意識，可以說，共同體、公民和契約三者是密不可分的，透過契約將公民觀念與共同體意識建立起來，才能形成所謂公民國家或市民社會。¹⁸

以市民文化權為主體的城市外交

正因為我們一直缺乏公民理念、公民權利與義務，以及共同體的意識，因此對於一些公共政策，一般民眾就會認為那是政府的事，或看待所有城市外交活動如同「船過水無痕」般，無關痛癢。而近年來台灣「社區營造」運動的背景和主要課題，即是期許透過社區社會的營造工作，以建立市民社會理想中的「社區共同體意識」，說的更直接就是在營造「人」(公民)，來改善台灣基層社會普遍缺乏現代國家的公民意識和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所以城市文化交流的課題也是一樣，不僅目的在建立市民的社區共同體意識，同時相對的，一旦共同體意識凝聚，才能共同決定出城市文化交流工作的前進方向。

簡而言之，城市文化交流政策或工作的目的與社區營造一樣在於營造「人」，使得公民得以透過整個地球村的社區或城市彼此之間，自由而順暢地平等參與、交流與學習，體認到所有公民均是世界文化共同體的成員，進而知道如何定位自身的文化與身為世界公民的角色，並找到與其他文化對話或互動的基礎，這也正是「公民文化權」所強調的理念之一。所以說，城市文化外交最終仍要回到「人」的身上，以市民的文化權為主體，而不是地方政府或國家政府為主體。

然而當前仍有不少地方文化交流或外交活動仍是以地方政府利益為主要考量，以今年台北市政府文化局主辦的亞太城市文化高峰會議為例，主辦單位耗費鉅資邀請亞太地區各重要城市的首長、國內外社會賢達與文化界學者，舉辦一連三天的座談會。¹⁹如此盛大的國際交流會議，結果只開放部分場次給少數名額的民眾參加，且這些民眾還是經過主辦單位「篩選」的民眾，納稅人出錢給政府辦國際活動，結果納稅人在會中反而感覺像是「次等公民」。類似像這種以方便主辦單位為考量、或是「階級化」、「貴族化」的文化交流活動不是只有這次，從過去的例子來看，像是各地方政府紛紛與國外城市締結為「姐妹市」，而諷刺的是多數市民說不出其姊妹市有哪些，如此空洞而樣板的城市外交例子，可說是不勝枚舉。所以，城市文化

¹⁸ ibid., p.13-14

¹⁹ 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於2000年6月9日至11日，於圓山大飯店舉辦「2000亞太文化高峰會」，會中安排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主講「亞洲價值的困境」、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社長杜維明主講「文明對話與文化亞洲」，以及香港城市大學教授張隆溪主講「香港、台北與城市文化」等，但這些場次並不對一般民眾開放。主辦單位提供100個名額給一般民眾報名，採事先報名，經大會安排確定後通知是否可參加。主辦單位只開放10日下午與11日上午的座談場次給一般民眾。



交流與理念和工作最終應回歸到落實「公民文化權」的原則，才不至於使所有的的文化交流遠離市民生活。

總結上述，「城市外交」的定位與目標和當前「社區營造」一樣，在於營造「公民」的意識與行動力，透過公民的參與以共同決定「地方文化定位與內涵」，進而從地方文化內涵謀求產業振興之道以帶動「地方振興」，而後從這些過程累積出的「地方精神」，使公民自然地擁有地方認同與共識，到達形成「公民社會」的理想。而這些過程無一不是需要靠文化的精神與理念在當中推動，而從長遠來看，自然環境、文化與歷史傳統的能量才是一個地方的永久資產和精神所在。

三、城市交流的具體實踐—以宜蘭為例

也許有人質疑文化是城市交流一個陳義過高的理想，然而，以今日與會的義大利、法國為例，像是義大利的威尼斯雙年展，與法國的亞維農藝術節，即可反駁這類的質疑。無處不是古蹟的浪漫水都威尼斯，不僅是歐洲資本主義與文藝復興的發源地，近代威尼斯更有心發展成電影、音樂、建築、展覽城，國際上赫赫有名的威尼斯影展和美術雙年展都是水都在這方面的成就。早自一八九五年即開辦的威尼斯雙年展，已擁有一百零二年的歷史，儼然就是一部現代藝術史，更是世界藝壇焦點。前來朝聖的藝術愛好者，可一次全覽各國最具代表或最重要的現代藝術。而各種新興藝術觀念也藉由威尼斯雙年展，進入國際舞台，如以往曾有觀念藝術、表演藝術等經由威尼斯展出，而擴大其藝術影響力，甚至滲入商業、廣告、流行藝術等生活層面，威尼斯雙年展的影響可以說是無遠弗屆，因此又被稱為「藝術界的奧林匹克」。

20

而每年於法國南部普羅旺斯亞維農鎮（Avignon）舉辦的亞維農藝術節，已有五十年以上的歷史，每年除了吸引大量戲劇愛好者與觀光客前往參觀之外，其相關紀念品與其他旅館、餐飲業等營收，也為當地帶來為數可觀的收入。另外法國還有全球電影界標竿的「坎城影展」，成為全世界愛好電影人士與「追星族」的朝聖之地。然而，究竟台灣地方在現實層面是否有條件展現地方特色？強調以「文化立縣」的宜蘭，以其「宜蘭經驗」充分而全面地展現地方特色，被認為是台灣地方政府建設地方的典範。

宜蘭經驗與城市交流

從地理和歷史因素來看，宜蘭的移民和開發史其實與台灣其它地區大致相同。二百年前噶馬蘭族世居於宜蘭平原，清嘉慶年間吳沙入蘭後，「淡蘭文風」即聞名全台。而「歌仔戲」這個唯一具有台灣本土特色的藝術形式，據考也是源於宜蘭。其他屬於宜蘭的地方土產、小吃、習俗以及腔調等等，均展現了這裡極深厚的人文歷史傳統。雖然這些條件台灣西部也都具備，

²⁰ 陳謝文，蔡文婷，面、目、全、非的台灣藝術——威尼斯亮相，光華雜誌，10月號，1999



但歷經橫掃全台的現代化建設，台灣西部文化傳統特色很快即隨之湮滅模糊。同一時期，宜蘭卻因山海阻隔，侷處東北一隅，因而保存相當程度的內聚力和整合度。

事實上，宜蘭經驗呈現了具體而微的台灣困境。宜蘭也曾發生「工商經濟」與「生活環境」兩種立場的對抗，但眼看台灣近年來生態環境保護主義與經濟開發政策相互矛盾，昔日「福爾摩沙」美麗島的景象逐漸失去，宜蘭最後選擇了「生活環境」，於是全縣從文化產業、生活產業、環境產業、休閒產業、學習產業的方向著手，以保有最佳生活環境品質的方式，來發展地方傳統文化的魅力，同時這些成果又回過頭來提供地方居民更多的就業機會與經濟所得。²¹

宜蘭經驗當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像是全縣性的童玩節、名校划船賽等，讓宜蘭打開國際視野；一鄉一特色的三星蔥蒜節、五節鴨母節、蘇澳鯖魚節、冬山風箏節等，經過文化性的推展，使地方產業更具競爭力；而發自基層社區營造，如：二節、玉田、白米...等，也各自展現其最珍貴的生命力；其它像是鄉土教育的實施、冬山河親水公園等公共工程藝術化、族群文化的提昇，或是終生學習與資訊網絡的運用等，使宜蘭的發展更平衡、更具遠景。難怪「遠見雜誌」歷次調查指出，全台各縣市中，就屬宜蘭人最具地方光榮感與驕傲感。

今日我們討論的主題是城市外交，而宜蘭載譽全台的「國際童玩藝術節」與「名校划船競賽」，正好是一個地方如何打破中央既定思維與艱難，成功的走出地方外交的最佳例證。童玩藝術節，原本是「宜蘭紀念日二百年」的系列活動中，一個「以兒童為宜蘭未來希望」為構想，後來來不及籌備而夭折的計劃。後來適逢當時文建會正巧推出輔導縣市舉辦小型國際展演活動計劃，且宜蘭主辦單位發現當前世界各地，並未有任一藝術節是以童玩為主題，於是在文建會同意補助下，最後決定以童玩與民俗舞蹈為主軸來舉辦藝術節，活動內容則包括了琳琅滿目的童玩展、刺激好玩的水上遊戲區，以及新鮮有趣的異國民俗歌舞表演等。

其實活動開幕前，主辦單位雖獲得文建會補助二千萬元，然其總投資額卻早已超過補助款數倍有餘，許多暫借廠商的款項，都等著票房長紅來支應。於是大家懷著忐忑的心情，宜蘭第一屆國際童玩節就在1996年7月於冬山河親水公園開幕，沒想到票房一路長紅，湧進總計十九萬六千餘人次的票房（今年的童玩節遊客人數總計更已超過五十萬），門票收入結算後尚有一千九百餘萬的盈餘，締造了公家單位辦文化活動，而能有盈餘供循環利用的新紀錄。此外，每年的國際童玩節不僅動員了宜蘭的國際社團與當地資源，同時亦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像是旅館、餐飲與名產業等等，更重要的是，它已成為台灣具代表性的國際性藝術活動之一。²²而另一個成為宜蘭特色的國際性活動，即是當時被稱為不可能任務的「國際名校划船邀請

²¹ 陳其南，文化的魅力，台灣的期待，引自陳廣堯所著，「文化、宜蘭、游錫昆」的序文，台北：遠流，1998，pp.3-5

²² 陳廣堯，文化、宜蘭、游錫昆，台北：遠流，1998，pp.272-292



賽」。事實上宜蘭很早即推展划船運動，然而地方要舉辦國際性活動，受傳統外交思維模式影響，中央大多反應冷淡，地方因此得要另謀管道。就是在這種處境下，宜蘭先是以承辦台灣區運動會爭取划船為正式比賽項目，後來又透過世界台灣同鄉會各國分會，代宜蘭縣政府發出邀請函請世界名校參賽，沒想到竟紛紛傳回好消息，構成 1996 年宜蘭國際名校划船邀請賽五國十隊的與賽盛況。²³

宜蘭經驗的可貴，在於她以台灣一個最偏遠、最窮困、最落後的一個縣市，卻選擇了另一條發展的途徑，成功的開創新局。她有可能成為台灣首屈一指最先進的縣份，甚至成為台灣未來選擇發展發展方向的指標。此外，宜蘭經驗亦為我們帶來幾點思考和啟示：

首先，台灣在過去經濟開發優先的施政方式，早已使生態環境與人民性命付上高昂的代價，台灣因此被認為是一個缺乏魅力、不適合人居住的工業島，然而宜蘭的例子正說明了，「文化」才是真正使得一個族群感到驕傲與光榮的基礎。其次，宜蘭不論是故鄉歷史的整理與傳承（鄉土教育與教材編纂）、地方特產與文化活動的結合（產業文化化）、創造宜蘭過年新傳統（歡樂宜蘭年）、文化活動國際化（童玩藝術節與名校划船賽）等各種施政方針，無一不是以緊密結合常民生活、提昇居民認同感為著眼點，於是居民的共同體意識便從這些過程中自然產生。第三，宜蘭童玩藝術節與名校划船賽活動被媒體譽為：「中央外交部做不到的，由宜蘭縣做到了」，這些國際性活動的確對打開宜蘭的國際知名度很有大幫助。然而這些經驗更可貴的，是使當地居民透過這些過程而能以身為「世界公民」與「宜蘭人」為傲，也讓全世界對宜蘭人有全新和親身的體會與認識。

未來城市外交值得關注的課題

從全球化和地方化，我們看到了城市外交的時代意義；而城市外交作為地域實踐的重要政策，需要藉文化成為實踐過程的「路徑」與目標，也就是透過文化性的思考與反省，來調整與修正政策或觀念上的偏差，進而落實公民文化權理念與市民社會理想。然而，如何使公民社會與文化權的內涵內化至一般民眾，進而敦促公部門在從事文化交流工作或活動時，能本於平等參與、對話、交流的信念，建立尊重多元文化的基礎素養，是值得我們共同努力的。其次，也許有人質疑全球地方化的趨勢忽略了相對於地方的「中央」角色，事實上，全球地方化在看待「去中心化」的思潮，「中央」的角色乃是以尊重、鼓勵地方自主為考量，因此在實踐上，將來「中央」如何扮演好專業技術、經費及其他資源提供者與合理分配者的角色？如何避免如柯司特所說的城市貧富階級懸殊問題，或地方與地方之間的貧富差距問題？如何在文化交流上儘可能鬆綁一些法令以配合地方從事國際交流？如何避免城市外交流於傳統菁英化、貴族化、形式化？如何避免城市外交或社區營造工作被現代性內化極深的精英機制所操作、切割和瓦解？這一連串與城市外交相關的問題，更是需要我們深思的。

²³ ibid. pp.292-295
206



跨世紀國際藝文資訊 從世界的視角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閱讀文化
On CULTURE And ARTS Experience in Resource
Management

NOTE
